

## ■ 新书导读

《国人辩论的表情》  
梁晓声 著  
中华书局

中国国民的素质如何？网络的兴起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思想话语的生态如何？草根与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作者针对当下国情、民情、士情，纵论网络文化、大众情绪、民生问题，呼唤理性提升与人文教育，带你看懂急剧变化的当下中国。

《孤独的克里雅》  
八千里路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人骑行于克里雅的游记，一个人在无人区待了十三天，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作者勇敢地走进去，活着走出来？作者吸取古往今来正史野史素材，为历史作最前卫解读，使隐藏在历史尘埃下的规则和真相昭然若揭。

《虾米妈咪育儿正典》  
虾米妈咪 著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儿科医生妈妈结合自身亲身经历，针对0-6岁儿童养育问题，从生理发育、营养与喂养、日常护理、行为习惯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讲述。



真实的北洋民国是怎样一种状态？内外各种势力如何博弈？世道人心如何演化？历史走向是否可以掌控？这一切与国民性有何关联？作者由晚清而入民国，由个案扩及群像，从大历史角度描述自袁世凯去世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嬗变。

有助于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行业公会与社团，如商会、律师公会、银行公会。他们有的聚集于各级议会之中，有的散落在媒体，有的独立存在于社会。出于职业原因，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是半合作半斗争。由于政府的故步自封，他们慢慢成为体制的敌人，利用体制，忍耐体制，批判体制，直至最后忍无可忍推翻体制。他们看似一盘散沙，却富有独立精神，他们的敌人，一直就是独裁体制和军事霸权。当然，他们之间同样也有争斗，这争斗贯穿整个国民政府时期。

五色斑斓，光怪陆离；礼溃乐崩，纲常不在；百废待举，疑虑如雾。这就是辛亥之后中国的现状。乱世之中，精神的大陆已被洪水淹没，只留下在无边的洪水中些许山峰像小岛一样露出水面。西方的各种思潮慢慢渗透到中国所有的孔穴，直达古老民族最脆弱的地方，它可能会成为一种药方，也可能导致病变的危险。从1912年到1928年，怎么都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时代。乱云飞渡之中既然上路，就得往前走吧——谁也无法算计得出，这个古老帝国踽踽前行，到底需要付出多少鲜血与财富的代价，以及动乱与反复的时间。

《晚清之后是民国》  
赵焰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

# 今天为什么要读阿伦特

□ 天宁

过去不再启示未来，人心在昏暗中徘徊。汉娜·阿伦特的经典著作《反抗“平庸之恶”》集中回应“平庸之恶”，反思道德崩溃年代的个人抉择。该书在中国一经面市，立即引发学界讨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阿伦特？

致敬阿伦特诞辰一百周年的电影《汉娜·阿伦特》2013年在中国的展映曾一票难求。从学界大环境到知识青年小圈子，阿伦特的锐利眼光和独特观点，一次又一次被人们援引，为有识之士思考我们的时代和时代中的我们背书。有趣的是，在德国，这部电影也在思想界引起了一番争论，争论的问题非常具体：阿伦特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平庸之恶”的历史典型——纳粹高官艾希曼，到底是怎样的人？阿伦特对艾希曼的描述以及评价，是正确的吗？如果不正确，“平庸之恶”的批判力量，是否会被撼动？

汉娜·阿伦特是德裔美籍哲学家，20世纪重要的政治理论家、思想家，与西蒙娜·波伏娃、苏珊·桑塔格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曾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阿伦特

一生致力于考察现代社会中的政治问题和人的政治行为，并对美国政治现实和犹太问题有着大量极富原创性的洞见。阿伦特曾经指出，20世纪道德大崩溃，不是由于人的无知或邪恶而未能辨别道德“真相”，而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为标准来评判人们当下可能做出的事情。道德需要重建，而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阿伦特最先被引入中国时，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她对极权主义的批判，那么最近对阿伦特的关注则转向了艾希曼审判之后，阿伦特对于恶的平庸性的思考。对阿伦特关注点的变化，也让阿伦特更多面的身份渐渐被国人认知，她不仅是位政治哲学家，也是一位在20世纪六十年代活跃在美国文化圈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对阿伦特的引介中，这位思想家丰富的人生和果决的判断，让很多之前并不了解阿伦特的中国青年，开始认识这位思想界的边缘人、

美国公共知识界的偶像、思考20世纪政治灾难最具启发性的德国女性。

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面孔，在她的几部作品中都有鲜明体现。《反抗“平庸之恶”》中，阿伦特深入探讨了与“平庸之恶”相关的政治与道德问题，如“极权统治下的个人责任”“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思考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等等。在人心无所依傍的时代，阿伦特犀利的视角和关切，为我们思考个人处境和选择立场提供了富有启迪的抓手。这本书是《责任与判断》中文修订版，首收中研院研究员蔡英文专文导读。《共和的危机》是阿伦特对美国政治现实的直接反映，是她将理论思考应用到现实政治中的体现。作品见证了20世纪六十年代越南战争、学生暴动、黑人民权运动以及七十年代前期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性动荡，体现了阿伦特的政治卓识。其中，《论暴力》尤为著名。阿伦特在书中提出了“权力的每一次衰落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第三世界不是现实，而是意识形

态”等著名论断，对政治学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康德政治哲学讲稿》则强调了个人在面对公共事务时的判断能力。这份讲稿是1970年阿伦特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授课稿。这一时期的阿伦特，已经度过了因报道艾希曼的审判而处于公共舆论风口浪尖的时期，但是对于艾希曼的思考，却没有停下。受审的艾希曼给阿伦特提供了一种解释，那就是现代人因拒绝思考、因推卸道德判断和行为判断而导致的“平庸之恶”。《康德政治哲学讲稿》就是阿伦特解决平庸之恶的一个阶段。在这本书中，她通过以“六经注我”的方式，重建康德的政治哲学，实际上是借此构建自己的政治哲学的基础。在阿伦特看来，正是判断能力，才构成了现代政治的基础，也正是判断能力，才保证了现代政治的正当性，以及政治与道德的不相违背。

《反抗“平庸之恶”》  
【美】汉娜·阿伦特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审判为什么不公正

□ 禾刀

先“发难”，最终揭开了面纱。这起案件的处理虽然一波三折，正义似乎还十分遥远，但媒体的介入让公众看到了促进正义的某些曙光。另一起舆论成功介入的案例当数众所周知、直接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

正因为对公开的渴求，1980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允许州政府让电视摄像机进入法庭。有趣的是，尽管直播在州法院日见寻常，但最高法院始终不愿引入直播，无论在司法界、法学界还是媒体界等各行业中认同度极高，现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斯卡利亚更是直言，“之所以反对庭审直播，就是害怕某些大法官在镜头前作秀”。

虽然对公开怀有期待，但卡德里对舆论介入审判又保持了较高的警惕性，认为“庭审直播比公开处决更有害”。想想其实也不难理解，每一个新闻从业员或多或少地存在主观性，一旦这种主观的倾向性观点生成，其舆论导向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很难说不会“感染”

萨达卡特·卡德里，作为律师，他曾协助起诉前马拉维总统海斯廷斯·班达。作为作家和记者，他的作品曾入围1991年度托马斯·库克旅行文学奖，《审判为什么不公正：西方审判史》曾于2005年获得英国犯罪作家协会非小说类作品金剑奖提名。

本书中，卡德里追溯了西方三千年的审判历史，再现了大量审判“典故”，比如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为了捍卫法律权威，苏格拉底放弃逃生机会。尽管本书书写的是西方审判史，但文字生动，读来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回首西方三千年的审判史不难看出，正是因为人们对正义怀有憧憬，审判才得以在激烈的利益交锋中破难前行。正义身影在西方审判发展进程中得以越来越多地彰显，尤其是近代，公开的力量当功不可没。比如参加“越战”美军战斗人员涉嫌射杀贫民的“美莱事件”，这起事件原本并不复杂，但由于美国军方出于“颜面”横加阻挠，试图将这起事件“雪藏”。结果被《华尔街日报》率

## 一碗《甜沫》的悲喜跌宕

□ 张艳

从文若非栖居于那凤凰古城，恐也无法生就那么多浪漫诗性的文字。刘强深信，每个作家，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理坐标，而这些坐标，便是这些作家的心灵栖息之地、文字生根之所。一片地一座城给予了作家无尽的创作灵感，城中事身边人也影响了他们行文间不同的笔触和风格。而城市与文学，想来，也不过是如此简单的关系。

济南给了刘强很多东西——方言、习惯、难改的口味，最宝贵的，当是城中人的悲欢离合。这些东西历经时日，镌刻在刘强的心里，也使他他的作品和故事难以脱离这座老城。

《甜沫》于他而言，恐怕与饮食无关，与口味无关，与之相连的，是对记忆深处旧时相识的诉求，是以口腹之感找寻旧时的心境。

《甜沫》中提到了“震天桥”的“马子妮”王晓梅，而作为刘强官扎营系列小说的第

刘强的碗《甜沫》，在这个燥热的夏日，在我心头吹过了一阵清风。

作为土生土长的济南人，作者刘强在官扎营这个地方度过了自己从孩提至而立二十余年。提起济南，刘强也是一脸骄傲。从济南第一条铁路胶济铁路，到后来成为各国列强争抢的枢纽；从旧时李清照的婉约寂清诗词到老舍笔下美到极致的冬天，这都是济南的印记，是这座城市在各个时期，为历史铺下的不同背景。刘强爱着这座城市，守着它的变迁。这二十多年里，官扎营陪着他，济南陪着他，或者他陪着这座城市，看尽了一条街的时光阡陌，人事离合。

谈起文字，就不得不说孕育这些文字的城市。贾平凹的文字，再深再远也从未离开过他的西北大地；陈忠实的笔下，再艰辛的故事也都上演在那片白鹿高原；张爱玲若是离开了旧上海，怕也难诉说那么多婉转纠葛的故事；沈

## ■ 速读

### 袁世凯死了

1916年6月袁世凯出人意料地死去，在中国的震动是全方位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那种属于旧时代，闪烁着重金属光芒般的威慑力和权威失去了。先是皇帝消失了，道统消失了，原先附诸偶像之上的神秘东西，如雾霭一样慢慢褪去；而现在，以权威的形式替代偶像和道统的袁世凯也消失了。仿佛一个意外结局，连袁世凯自己都没有回味过来，还没来得及伤心或者悔恨，就破碎不再，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民国成立后，身为共和国总统的袁世凯像一只山林中的老虎突然置身市井闹市一样困惑和悚然。袁世凯与时任内阁总理秘书的顾维钧有过这样一次谈话——袁世凯问留美博士顾维钧，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顾维钧的回答是，“共和”意味着“公众的国家或者民有的国家”。袁世凯困惑地摇了摇头，表示不明白。袁世凯的担忧是，作为中国老百姓，他们能理解这些道理吗？袁世凯举例说，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会把垃圾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洁，至于大街上脏不脏，她才不管呢！顾维钧说，民众的无知可以通过教育、法律、制度等来加以改变。袁世凯说，那岂不是几个世纪？

袁世凯的担忧和几个世纪的转变之说，如今看来并非毫无道理。事实上，辛亥革命带来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共和国，那种匆忙之中仿效西方建立的宪政更像是空中楼阁，甚至连倡导者也没有系统而全盘地规划，就匆匆上阵了。

### 沙丘上的象牙塔

辛亥革命之后，很多人都满怀希望地把中国看作是“另一个美国”，但从辛亥革命后北

## 晚清之后的乱局

□ 依文 整理

京政府的组成人员结构来看，这是一座建立在沙丘之上的“象牙之塔”。它很漂亮，像模像样，不过稍有判断力的人都知道它缺少相应的基础。辛亥革命没有触碰到社会的基础，传统专制势力仍旧猖獗，民众依旧愚昧，“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把持政权的依旧是前清时期的官吏和乡绅。让民众们感到不适应的是，没有了皇帝，“国”只是交给了一个叫作“总统”的人管理。对于所谓国会的运作，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等西方话语，绝大多数中国人更是一头雾水。

从某种程度上说，有关美国政体的引进，实在是“迷信”的产物——引进这套体制的人，坚定地相信它会给中国带来光明的未来。严格说来，一套制度的引进，需要必要的准备、酝酿和试验过程，然后再以坚定的态度和足够的保证来扎实地推进。虽然这种共和的方式使得中国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世界先进大国，但对于中国来说，也许可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并且将伴随着无休无止的纠缠和动荡，绝不是“立竿见影”。

### 新政府的从政者

新建立的“象牙之塔”中，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混杂在一起；坚定的宪政信仰者，与传统的权谋者厮混在一起；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与各种各样乔装打扮的卖国贼纠缠在一起。这种庞杂的组成结构，使得北京政府的任何一个举措，都掺杂着很多复杂的因素，真假难辨，莫衷一是，也使社会推进的思想和平调不可能一致。按照出身和教育背景的不同，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组成人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年龄组：一是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人，代表人物是袁世凯(生于1859年)，他们当初接受的，是传统的科举正规教育，学的

是儒家经典，树立的是“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对于清帝下野，以及宪政的施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持保留态度，对宪政谈不上理解深入，也谈不上坚定不移；他们信奉的，仍是传统的“王天下”以及中央集权政治。这些人大多富有政治经验，热衷于权谋和韬略，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望。二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在接受了相当多传统教育的同时，又普遍接受了新式教育。出生于1873年的梁启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一批人的骨架，可以说是传统的，但他们又拥有新式教育的某些血肉。跟他们的前辈一样，希望政治平稳过渡，有明显保守主义的倾向。因为受到日本和西方的技术、政治、文化的影响，这部分人较善于掌握共和政体的政府形式，对于铁路经营、金融和对外关系具有领导能力。在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中，这一年龄组的人占据绝对优势。第三，就是出生相对较晚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人，是组织中的新锐者。他们有着比较好的新学背景，由于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这些人当中有很多都是革命党，他们相信很快就能在废墟上建立起高楼大厦。他们倾向于抛弃中国的传统，照搬外国的思想和社会时尚。当然，以年龄为层次结构判断和归类，总有些武断或不准确。譬如孙中山，这个1866年出生、只比袁世凯小七岁的革命家，无论是性格，还是主张，甚至比小他二十岁的人都更激进。

### 盘丝洞里的关系网

虽然北京政府号称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它的制度表面上看是合乎宪法的，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由法律予以区分，决策也按规定程序制定，不过中央政府的组成，以及从政者的心理，仍带有很大中国旧政治的影子，富有现代政治理想和理念的人少之又少。包括袁

世凯在内的很多人，很多时候习惯以旧的手段和方式，来推动制度的运转。不只在外部，更有内部的纠结：理性和公正缺乏，阴谋无孔不入；暴力虎视眈眈，派系无所不在。一大批个人追随者，越过法定制度的界限在运作；每一派系以一位特定的领袖人物为中心，由其吸收忠诚的追随者组成。派系领袖特别强调的是对自己的忠心不二。因此，庞杂无比的关系纠缠着政治军事和社会交往：亲戚关系、曾经的上下级关系、夫妻、师生以及同乡之类等等，这样的条、线、块牵连，就像百年成精的蜘蛛一样，在洞穴里构筑着阴暗厚实的关系网，整个中国就是硕大无朋的盘丝洞。对于领导者来说，与所任用的人之间，只有确定了某种关系，才是最可信任的，至于能干与否，反倒不那么重要。可用之人本来就少，而有确定关系的，更是凤毛麟角了。

与政治高层的派系相对应的是，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势力蔓延滋长，上千种势力在划定范围，上万种思想在扯着大旗，古老而庞杂的帝国，各种各样的思想和疫情同时流行。

### 乱云飞渡

乱世的重要标志，是原先看似铁板一块的权威四分五裂，新的集团和新的势力应运而生。掌握着中国命脉的强权者，在“官智未开”的情况下，虽然名曰踏上一条“康庄大道”，但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朝三暮四、心怀鬼胎，他们不是规矩地执行宪政，而是窥视时机尽可能寻求权力以及私利的更大化。他们奉承的，以及他们所做的，仍是数千年来以的阴谋政治。

乱世的另一种力量，是散落在民间的各种新生势力——企业家、商人、银行家、教育家、律师、工程师、记者、作家等，他们一直游离于刻板的体制之外，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陆续成立了